

文章编号: 1674-3180 (2009) 04-0183-04

# 从大陆迁台书家的创作看 “民国书风”的延续

钱先广

(厦门大学 艺术学院, 厦门 361005)

**摘要:** 迁台书家的书学思想、书学主张及书法创作, 无疑在台湾刚刚摆脱日本殖民文化统治后, 重建台湾书法新格局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两岸关系的日趋缓和, 台湾书法的轮廓日益凸显, 本文旨在就迁台书家的书法创作, 来讨论在台湾特殊的社会政治形态下, 迁台书家如何把“民国书风”这一传统在海峡彼岸的台湾延续, 依此来为当代台湾书法格局的由来做出一种诠释。

**关键词:** 大陆迁台书家; 创作; 民国书风; 遭遇

**中图分类号:** J292.1

**文献标识码:** A

## Continuation of Calligraphic Styles of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Calligraphers' Works after Moving to Taiwan

Qian Xian-guang

**Abstract:** Living in a time of radical changes, the destiny of calligraphe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lso bound with the mysterious politics at the time. After moving to Taiwan, they just broke away from the colonial rule of Japan, calligraphers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played a key role in reconstructing a new calligraphy pattern with their ideas, proposals and works. As cross-strait relations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calligraphy system in Taiwan is gradually highlighted.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se calligraphers continue calligraphic styl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under the special social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 and offers an interpretation for the present calligraphic pattern in Taiwan.

**Key words:** calligraphers moving to Taiwan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creation; calligraphic styles of Republic of China; experience

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许多重要物资与人相继迁台,如故宫、史博、中研院等。在随行的队伍中,书法家并没有缺席,其中有吴敬恒、于右任、丁治磐、董作宾、朱玖莹、庄严、台静农、刘颜涛、奚南薰等,时代命运的拨弄让他们

成了“迁台书家”,开始了海峡两岸的人为阻隔。他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云谲波诡的政治黏合在一起,在那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和聚合。迁台书家的书学思想、书学主张及书法创作,无疑在台湾刚刚摆脱

收稿日期: 2009-06-02

作者简介: 钱先广(1983—),男,山东聊城人,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书法研究。

日本殖民文化统治后,重建台湾书法新格局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两岸关系的日趋缓和,台湾书法的轮廓日益凸显,本文旨在就迁台书家的书法创作,来讨论在台湾特殊的社会政治形态下,迁台书家如何把“民国书风”这一传统在海峡两岸的台湾延续,依此来为当代台湾书法格局的由来做出一种诠释。

中国疆域辽阔,对边陲艺术史的研究和关注往往被界内所忽视,由于台湾长期与中原主流文化相阻隔,使得其艺术形态多处于边缘上的行走,书法也不例外。从纵向来看,清朝时期的台湾书法依然笼罩在清代书法的大格局之中,“在连横所著《台湾通史》列传中,固然可以找出一些擅长传统书法和绘画的本地文士与匠人,但当时一般文人或乡绅多以艺术活动为附会风雅,而专职者社会地位不高,又往往散处各地,很难互相切磋,提高水准或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派别;甚而可以说,清末台湾的艺术活动相当保守而尚古。以书法而言,最常见的便是应付科举考场的馆阁体,即规矩方整为原则讲求‘颜体赵面’的精湛圆润趣味……清代台湾传统书画界的另一种特色为与福建、广东一代的密切关系。进一步观察则发现,台湾文化艺术各方面从策划者到技术人员往往都仰赖大陆沿岸地区的支援,不但主政者多由内地短期调派,在台湾正式建省(1885)以前,有志于仕途的学子们在乡试秀才之后,便得远赴福建参加科举。故而,文人雅士也多仰慕内地文风,商贩从沿海地区远至上海、平津一带搜购书籍、字画古董返台,往往成为争购的对象。而因为地缘与语言的接近,福建的文人经常被延揽至乡绅家中担任教席,或以书、画家的身份为其挥毫装饰门额堂庑,或协助其收藏古董。”<sup>[1]</sup>中日甲午战争(1895)之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传统书法遭到日本当局的排斥。“1927年以后,台湾教育会年年举行台湾美术展览会。这些传统书画家都没有参加这项展览,因而被排挤在美术的主流之外。只是因为日本当局借口这些作品是用中国的表现形式,不符合时代的精神。其实就是文化歧视和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做法。”<sup>[2]</sup>五十年的“日据”,也使得日本的书法教学方法在台湾产生了深远影响,历经“日据”时代的台湾本土书家曹容,曾言道:“日治时期,授我子弟以

结束岛国精神之变体魏碑字,由学校注入,数十年来,文字书法、体制,几变于夷矣。”<sup>[3]</sup>这段文字写于1948年,真实纪录了“日据”时代台湾书法教育“被灌输”的尴尬局面。由此可见,20世纪中叶台湾书法正处于久伤未愈的境地,特殊的社会背景投射到艺术舞台上,使得台湾的书法表现出与大陆决然不同的发展路向,其中所反映出的艺术问题,正是我们今天反思历史最具代表性的个案样本。从清朝到“日据”时代,台湾一方面接受母体文化的滋养和影响,另一方面也经受着殖民统治的冲刷与洗礼,传统与现代在此不断消长、激荡、融合,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象。台湾的书法经历了接受、容忍、糅合的阶段,这“一波三折”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台湾书法在边缘行走的同时,再度遭遇裂变。迁台书家群体遭遇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境,由于种种磁场的缺失,使得台湾书法与“民国书法”的传统无法实现信号对接,陷入两难的境地。

之所以能形成书法家集体渡台的现象,其实多缘于书法背后他们特殊的社会身份。那么,这一群体有什么共同特征呢?关于民国时期书法家身份的描述,王朝宾先生有这样的文字:“民国历时三十八年,书法家大体分为前后两代,第一代书家大多出生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受到系统的封建文化教育,博通经史,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又受到西学的影响,学术思想已较他们的前辈开明,帖学、碑学功底深厚,入民国后已人书俱老,自成面目。他们在民国时期的创作达到了艺术的高峰,其书法活动对民国书坛发生着直接影响,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第二代书家大多出生在清光绪年间,其主要艺术活动和成就在民国。他们既受到严格的国学教育,又大量吸收西方文化,许多人留学日本,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参与政治变革和新文化运动,几经动乱,社会阅历广,跨度大,思想活跃,治学严谨,其知识结构已较他们的前辈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有较深的传统功力,又具有很大的创造性,他们是民国期间成长起来的书家,对民国书法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新一代书家才是民国书法的真正代表。”<sup>[4][5]</sup>迁台书家多是上述中的“第二代书家”,从逻辑上讲,他们在世俗心态上的居高临下与政治心态上的优越感,应该能力挽台湾书法的濒危厄运。但事情往往相

违，由台湾“文化总会”策划的《台湾艺术经典大系》丛书中的《书法艺术·卷1》绪论部分曾这样写道：“回顾国民政府前台初期，由于政治上的不稳定及经济普遍萧条，书法的发展短期间是停滞不前的！约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府有鉴于大陆发起文化大革命，非理性的破坏传统文化与文物，而全面推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加上台湾的经济正值起飞，书法活动逐渐蓬勃，学校教学、竞赛、私人授课、书法社团成立都蔚为风气；出版品出了历代名碑佳帖外，也出版在台知名书家的作品集，连同日本精印字帖也逐渐面市。”<sup>[5]15</sup>从渡台之初直至于右任离世（1964）的十余年间，台湾书法从久伤未愈迈向了“真空”状态，这段时间对于迁台书家乃至民国书法的代表人物于右任来讲，最后的岁月又是多么珍贵！他的资质和才情足以能走得更远，但台湾书法资源的贫瘠与交流气氛的失语，共同导致具有大家风范的于右任走向了书法创作的低谷期。1957年，他得见居延汉简出版，感慨万分，曾作诗三首：“（一）此生得见居延简，相待于今二十年。为谢殷勤护持者，乱离兵火得安全。（二）故友书家王世镗，心魂日日在敦煌。及闻得宝居延海，垂死犹呼木简香。（三）远征考古真不易，守缺抱残亦至艰。从此居延多少简，公开散布到人间。”<sup>[6]402</sup>其中饱含喜悦之情，勾起了对大陆友人的想念，也夹杂着对美好明天的憧憬。1964年，他在《诗赠颜涛二首》中：“（一）芝兰之室绿芸芸，画里芝兰有泪痕。自古画人分地理，一支大笔起中原。（二）梦里天山旧战场，百年雪耻在边疆。早知一战安天下，悔不决心有主张。”<sup>[6]446</sup>此诗字里行间透射着一种悲凉意境，刘颜涛曾按语道：“此盖为先生绝笔之作，并亲书轴为赠；辑诗至此，泪随墨下矣。先生对颜涛关注既殷，期望亦切。而暮年才尽，报恩无期，天道固如斯耶？噫！吾欲何言，吾欲无言。”<sup>[6]446</sup>于右任怀念大陆的思乡情结始终贯穿在渡台后的岁月之中，一代大家就这样“归骨于田横之岛”。目下台北士林外双溪的宏大建筑群即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在1965年才落成的。也就是说，在运往台湾的十六年后，这批国宝才得以全部重见天日。此时，于右任无缘得见，已谢世一年，这批珍贵的国宝没能及时地物尽其用。再加上台湾本土书法碑刻资源年代多近明清，风格多是陈词滥

调的馆阁风气，与大陆的秦砖汉瓦相比，自然少了开拓上的契机。所以，近几年在大陆所看到由“台湾文化艺术机构”主办的于右任专题展以及有关拍卖会上的回流作品时，不难看出他并没有完成书风的最后嬗变，难臻人书俱老。客观地讲，于右任书法艺术的辉煌是在大陆时期。

来到陌生的台湾，他们了无战乱引起的不安和焦虑，并受到了“礼遇”。蒋介石在台湾“复职”时，请出吴敬恒授证，自撰对联亦常请他书写，并以师礼代之；于右任主持的政务渐上轨道，书法也从渡台前的躁动腾挪复归闲静，对《标准草书》不断地进行修订；作为将军的丁治磐辞去戎服，转为文职，将书房取名为“补闲斋”，希望读过去未读之书；董作宾继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专注于甲骨学研究；朱玖莹退休后，摒弃一切俗务，以精研书法、推展书艺终老；庄严长期浸淫文物，流觞雅集；台静农因政治环境的改变不利于小说创作，书法变成了他心灵的重要寄托；刘颜涛致力于标准草书的研究、修订、推广以及对历代草书的整理、爬梳；奚南薰乃济世儒医，用心篆书。环境变迁与身份转型带来的影响无不表现在他们的书法作品中，吴敬恒的篆书明显少了大陆时期的用笔单调，多是沉着朴厚，气象格局也拓大了许多，迁台后四年谢世的他，在最后做到了苍古俊秀；渡台后的于右任在创作方向上更多选择的是草书，想必与他做的“标准草书”运动不无关系，那种大气磅礴、碑帖融合的“魏碑式”行书已少之又少，多是不具规模和气势的草书作品，不过，相对于迁台前夕的《中吕醉高歌》作品中的匆忙躁动，他回复了平静；丁治磐则铁骨铮铮，随退却沙场，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戎马生涯并没有什么消解，骨太胜而韵致少，欠缺的是些许的从容；董作宾积累了大陆时期大量摹写甲骨文的经验，有着忠实对照原片、拓片的实践功夫，在书法创作时对甲骨文的分期有着严格的界定，用笔温文和缓，章法上绚烂多姿，最终列入了甲骨书家的队伍；朱玖莹渡台后逐渐从碑帖临摹的探索中，丰富了书法创作的视野，作品朴厚自然，他的书房中曾悬一联：“敢以退休忘国是，且拼余力作书痴”，作为长寿书家的他，退休后有三十年的时光潜心翰墨，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强韧的生命力也渗透到了作品之中；大概是由于职业的缘故，庄严的

书法在取法上较为广博,类似褚河南、瘦金体、赵子昂、北齐刻经、好大王碑等风格的作品大都能在笔下展现,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不足,离古典太近,没能融会贯通;台静农可谓诸体兼备,尤其是行草书,力追倪元璐的朴茂奇绝的体势和血肉丰劲的用笔,又融合了六朝书法的遒厚,使得笔势上多欹侧,结构空间灵活,产生了沉郁劲拔的艺术效果,风格独具;刘颜涛追随于右任的书法图式,少的是于字的大方,多了几分儒雅,看来书法确实要取法乎上;奚南薰的篆书线条静穆平和,神完气足,与其擅长医道有着直接的联系。相对于迁台之前流离迁徙的岁月,在一水之隔的台湾虽然有着安定的环境,但他们在书法创作上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多是因循,迁台书家在艺术上的能量未能及时有效地散发出理所应有的光芒。

伴随着他们的陆续迁离,王朝宾先生所描述的民国书法(1911—1949)的乐观景象已不复存在:“民国时期的书法承清末碑学之绪,集前贤之睿智,纵势为尚,变古为新,南、北兼收,碑、帖互用,走上了自觉的发展阶段。其中行、草书继宋、明之后,在经历了帖学靡弱、碑学严谨的曲折道路,得到迅速发展,称雄书坛;章草书沉寂一千余年之后再放光彩;钟鼎、石鼓成为热门;甲骨文为专家学者所注目,独辟蹊径;正书推重韵度,各呈异趣;隶书和小篆沿清末之余波,走上程式化的末路。”<sup>[4]2</sup>迁台书家在孤岛上保住了书法的血脉,他们的到来,对于台湾来讲是空前,也是绝后,因为他们大都是饱学之士,而且年近中年,有着丰富的书法经验和体验,就目前台湾书法的整体水平来看,不难发现他们并没有衣钵传人,此种现象的发生有着深层的原因。“国民党政府渡台之后,为在逆境中维护其统治,把中华传统文化树为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反共复国’的精神动力,教条式地向民众灌输,

并严格规定了其内容,这是不正常的,致使中华文化从富于精神感召力的中央文化,蜕变为带有强制性的、灌输性的‘官府文化’。这导致在台湾年轻一代中,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逆反和疏离的心理。”<sup>[7]</sup>加上西方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在美国对台实行政经军全方位的援助的形势下大举登陆,年轻一代几乎尽染,书法被演绎为颇具争议的“水墨探索”、“抽象水墨”等光怪陆离的形态,在两岸三地的书法格局中,台湾书法步履艰难却不思回头,书法的薪火在台湾越来越缺少后来人。

书法不是单一的文化现象,更何况是在台湾。就大陆来讲,是故经济发达的新兴沿海城市书法氛围相对冷清,而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却如火如荼,可见书法生态的培植不是朝夕之功,即使是名家擅场,高手云集,也多是昙花一现。书法生态的启动和重建,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倾听来自不同阶层和不同领域的声音,形成公开、透明、健康的互动结构体系,这应该是书法艺术可持续发展的良策。现当代台湾书法特殊性的生成与其长期孤悬海外的历史情境是紧密相连的,迁台书家们的创作较之于渡台之前,也越来越走向窄胡同,这种症结大概是源于生成土壤的缘故。想想1949年他们的那次抉择,是幸运或是不幸,只能让后人空发几声唏嘘和叹息。

#### 参考文献:

- [1]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台湾近代史之文化篇 [M]. 台湾南投: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 1997: 73.
- [2] 宋光宇. 台湾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368.
- [3] 曹容. 金石文字 [M] // 台湾省通志馆刊. 1948: 39.
- [4] 王朝宾. 民国书法 [M]. 郑州: 河南美术出版社, 1989: 5.
- [5] 渡台硕彦, 书海扬波 [M] // 台湾“文化总会”. 台湾艺术经典大系之书法艺术卷: 1. 台北: 艺术家出版社, 2006: 15.
- [6] 刘永平. 于右任诗集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6: 402.
- [7] 庄礼伟. 百年来台湾文化的源流、属性与变迁 [J]. 东南亚研究, 2005 (3).